



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有责任有能力

诸大建

新民时论

有报社记者撰写有关巴黎气候大会的社评文章,来电问笔者:为什么世界重要媒体都把巴黎会议通过气候变化协议列为头条新闻?我说这当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,历史会不断对此做出证明。

今年以来笔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包括7月份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科学大会,多半与巴黎会议有关。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,是希望的实现并超过了预料。如果

说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(IPCC)是因为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,那么和平奖同样应该颁给为巴黎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联合国、法国以及中美等国家的领导人,巴黎会议的成功同时也揭示了全球环境气候治理领域的三个转变。

首先,全世界将由此从化石能源时代进入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时代。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转型的确立需要科学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认同,从科学的角度,证明气候变化是否确有其事以及为什么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关;从政治的角度,证明世界要不要发

起一场抵抗气候变化,以实现能源变革的新经济社会运动。科学方面的认同,开始于IPCC 20多年来的工作。IPCC 1988年成立,1990年发表第一份气候变化报告(AR1),到2007年AR4报告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有90%的可能性,由此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;政治上的认同,源于1992年联合国通过有将近200个国家签约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,但是后来的发展有波折。这次2015年巴黎会议,表明科学的结果和政治的结果终于达成了一致。巴黎会议表明,全世界正式进入化石能源减少、可再生能源增加的能源转化时代已经铁板

钉钉,从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到普通老百姓均要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;2016年将是全球新能源时代的元年。

其次,全球治理从各自为阵的零和博弈走向了有底线的相互妥协。正如有人所说,要200个各自活蹦乱跳的猴子一起正步走,是极其困难的。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,涉及多种多样的国家利益。以往各次谈判,200个签约国各有各的主张,这次巴黎会议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。谈判各方的心态从你死我活到相互妥协,很大程度源于在全球治理运动中倡导一种有弹性的体制安排,即从自上而下的强制减

排模式,转向自下而上的志愿减排模式。我相信,巴黎会议其实与解决国内资源环境问题方向一致,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的远见大大超过了国内许多学者。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中美之间、中法之间、中德之间、中英之间的首脑会议,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,提出每隔5年做一次检查。所有这些,均为巴黎会议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,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领导力的表现。(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、教授)

来越多地认识到不是人家要我们做,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做,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其实与解决国内资源环境问题方向一致,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的远见大大超过了国内许多学者。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中美之间、中法之间、中德之间、中英之间的首脑会议,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,提出每隔5年做一次检查。所有这些,均为巴黎会议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,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领导力的表现。(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、教授)

崇洋媚外

任大刚

结舌者言

是否获得“外国友人赞扬”,至今仍是一些工作成效大小的生动指标。能够获得外国友人赞扬的工作,检索下来,近两年来包括给外国人带路、指路,带外国人观赏美景、开幕式,品尝美食,等等。

在古代的各种典籍中,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体验和感受,很少被记录下来,获得“外国友人赞扬”之类的话更是绝无仅有。这其实不难解释,盖因近代以来,骄傲自信的中国人从外到里,被强悍的外邦一步步击败,百事不如人,危亡之际,自信全无。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就是模仿学习强国,那些在其本国的各色人等,哪怕是引车卖浆者流,一进中国,俨然导师,他们“赞扬”与否,似乎比一万个中国人的感受还重要。

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虚心学习乃天经地义,但四处宣扬一些事关民生福祉的事业获得“外国友人赞扬”,似乎有些过了,如果此间又不把本国普通人的感受加以认真考虑权衡,这样的学习有多大意义?

战国时代也存在国与国之间相互借鉴经验的问题,韩非子不反对借鉴外国经验,但认为如果借鉴不当,危害更大。苏代批评齐王不信任大臣的故事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且说苏代表齐国出使燕国,感觉如果不能给燕国的相国子之实际好处,外交事务恐怕会办得不顺畅,连赏赐都得不到就可能灰溜溜走了。于是见到燕王时,苏代高度赞扬齐王。燕王问道:“齐王这样贤明,他一定会称王天下吧?”苏代说:“救亡还来不及,哪来得及称王?”燕王问为什么,苏代回答说:“他对所喜欢的大臣不能恰当使用。”

燕王对这个解释感到不理解。苏代解释说:“过去齐桓

公喜欢管仲,就立他为仲父,国内大事由他主理,国际大事由他决断,他主持全局,所以能够匡正天下,多次与诸侯会盟。但现在齐王对所喜欢的大臣却任用不当,所以会灭亡的。”

燕王听了若有所思,说道:“我现在已经任用子之做相国,难道天下还没有听说吗?”第二天,朝会上的一切决断,果然都听从于相国子之。另一种说法是,相国子之听了苏代的对答,派人送上合计两千两黄金,任他提出什么要求。

这个故事中,燕王向齐桓公学习的改革举措,实际是苏代和相国子之联手做局的结果,在韩非子看来,这样的改革使燕王大权旁落,不符合法家专权的理念。

子之获得大权后,逐渐蚕食燕王的权力,最后燕王干脆行禅让之事,把王位让给了子之,自己做了子之的臣子。子之执掌朝政三年,燕国大乱。齐宣王在孟子的说服下,攻打燕国,杀了逊位的燕王和子之。到第二年,燕国才拥立新君。

燕王的改革之所以失败,固然在于中了苏代与子之为了个人私利设计的圈套,更在于他机械照搬齐桓公的成功经验。齐桓公任用管仲,但是君臣之义并未紊乱;而燕国之乱,是在燕王禅让王位之后。是君臣之义紊乱在先,国家大乱在后,跟君王是否需要专权没有多大关系。恰恰相反,正是由于齐桓公向管仲分权,放手让他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,才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在这点上,韩非子的总结显然是错误的。

燕王可能太需要强大了,因此对前辈强者齐桓公的学习囫圇吞枣,其仰慕态度,与现在有些人“崇洋媚外”相仿佛。“崇洋媚外”在今天已是贬义词,但它的曲笔“外国友人赞扬”仍大行于世,一种“平视”的文化态度仍未在内心深处建立起来。

冯唐还不是最坏

朱绩崧

北窗絮语

一向乐于阴谋论的我,最近有个揣测:是不是因为圣诞在即,书商又想造个大新闻,助推销量,所以在微信朋友圈里负面炒作了7月就面世的冯唐新译泰戈尔?要说这群高级黑,真是看得笑岔气:“一场针对文学的恐怖袭击!”“荷尔蒙满满,读完你肿胀了吗?”“分明就是《飞扁集》!”“泰戈尔成了郭敬明。”我这才想起,去年8月,曾就如何理解《飞鸟集》第219首这个问题,与冯君在网上有过一番笔墨往返。

那时并不曾想见,最后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,竟会是“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”、“有了绿草,大地变得挺骚”这般腔调。当网介绍说浙江文艺社“更有诗意和韵律的《飞鸟集》译本”,附以译者自述:“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,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……我固执地认为,诗应该押韵……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,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……在寻找押韵的过程中,我越来越坚信,押韵是诗人最厉害的武器。”很显然,执迷于语音之美的妇科肿瘤博士淫于“韵”而失乎“律”,已分辨不出泰戈尔同二人转的本质区别了。

这大概也怪不得冯唐。要怪就怪翻译作品的阅读环境改变了。昔时是你看不懂外文,没关系,我来翻译,翻译完了,你只管看便是。读者对于原著的理解,完全依赖于译文。译者就像在为一群盲人描述眼前的春色满园,哪里姹紫,何处嫣红,怎么说,说多少,全凭良心。举莎士比亚为例,原文难点,即便遇到朱生豪、梁实秋,也有蒙混过关之处。现

今,外文人人学,原文容易找,读者水平或不及译者,但把疑问往微博上一贴,圈几位方家高手,分分钟可以引发激烈争论。判断高下的“不二”标准是谁符合原著的意韵气质,不是谁的语言抢眼——要说《飞鸟集》(Stray Birds)这本书题,冯博士以为作《迷鸟集》、《飞鸟集》方佳。才才愚见,凭着陆放翁、元遗山给的灵感,阿拉来个《惊鸿失伴》或《只影向谁去》,岂不更“骚”?但这项事业就变质了,献给读者的,与其说是二手的泰戈尔,倒不如讲是蠢蠢欲动的我们,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所说的“其诗作所揭示的深沉意蕴与高尚目标”、“用西方文学普遍接受的形式对于美丽而清新的东方思想之绝妙表达”压根不沾边。

时移势易,忙于夹带私货,或径如冯唐般,敲锣打鼓地改头换面,还真不如做一点贴近读者,同时也贴近原著的工作,即我所谓的“由译入意”:译者是导游,要带领读者深入原著,告诉读者,哪里是激昂的,哪里是幽默的,哪里与哪里关照,哪里与哪里矛盾,哪里是无法翻译的,哪里是难以理解的(可惜,极少有译者敢于承认),还应说明,整节整章乃至整部书,其意义究竟“可能”是什么。强调“可能”,为的是尊重不同的解读。不妨随感加注,也可长文总谈,甚至可以网上开课带领大家一起读。怕就怕,有的译者自己读完译完,一丁半点的解读都没有。以其昏昏,使人昭昭之流,今日绝非罕见。这正是严肃翻译萎靡不振的病根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冯唐还不是最坏的译者,因为读他的译作,不至于沦为“迷失的鸟”,只会渴望飞向上乘译作的怀抱。

信仰的意境

姜泓冰

拾字街头

中华艺术宫近期有个名为“信仰的意境”的展览,开张时未见多少宣传,却值得一看。展出的是印度的美术作品,有400多件之数;创作的艺术家们,以当代居多,作品里面也不乏装置、雕塑、拼贴、影像、多媒体之类形式——只是,走在其中,几乎很难区分出哪个是古典时期的,哪个是当代的创作。甚至,在近一个月前,看罢那个挤满古老的西藏文物珍品的“雪域珍藏”展,径直走进“信仰的意境”的展厅,也毫不违和,只会有些时光停滞的恍惚和错觉。

对于印度当代艺术,此前知之甚少。但仅今年,仅中华艺术宫,就已办了两回印度美术作品展。前一次是在春天的“眼睛与思想”展,作品更偏前卫,但从主题思想到绘画语言,仍然时时处处透露出宗教的气息。这一次的展览,规模更大,题材则单一,铺天盖地尽是宗教人物形象、宗教掌故情节,且也多是以传统手法创作,艺术家的个性算不得鲜明,常能见到同一段故事、同一个神灵被反复揣摩,还有不少花工夫费时间不讲“效率”和“效益”的细密画、镶嵌工艺。这样的态度和做法,是生活在缺少信仰国度 and 时代中的我们,早已陌异了的。作品中几乎一例,有着民间艺术般的明亮饱和、繁复又纯净的色彩,有着深受佛教、印度教影响的对生命、自然、世界的理解和体认,既有传统之根,又俨然是现代的、可以通往未来的。

中印比邻而居,体

量、发展阶段与社会状态也差相近似,也许,正是因为强盛的宗教文化与信仰力量,才让印度的当代艺术没有像我们一样,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与西方艺术的接轨和蜕变,光怪陆离,多机巧、善消费,却很少有动人心弦的力量。

并不是想倡扬宗教,但人要是有所信仰,能够体会“信仰的意境”,却是必须。“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”是今年坊间最流行语之一。听着很励志。然而,比“有梦想”更重要的,是坚持;信仰,则是支撑起“坚持”的力量。

这样的感慨,也缘于崔维成的故事。这位当年“蛟龙”号第一副总设计师,一心想要制造出万米级载人潜水器,去挑战11000米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。在很多人眼里,这是个大大太遥远的梦想。预算的开发投入高达10亿元,国家短期难以立项支持,他就自创科研中心,自筹资金,再募集民间资本支持,仅两年时间,开发的“彩虹鱼”号已完成4000米深的南海试潜,4800吨的科考船就快造好,明年就要去万米海沟探测考察;一间商业化运营的彩虹鱼公司也已壮大成了集团。

不是偏执狂,有科研管理的能力,一件别人看来“不可能的任务”,被他做得顺风顺水;四方“化缘”时并不自以为苦,成果渐显时也不想让自己趁机发财。年轻时就追慕李叔同的崔维成说,根由在于信仰:对科学,对人生,对世界,既有理性,更有信念与信心。有信仰,才能克服千难万险,自在别人不能及的意境。